

最后的天台

戴剑

在我心里，我家的地址只有一个——九龙路123号。沿着平安里往南走、无名小河浜汇入黄浦江前的最后一段，寂静的路边有一个次品瓷器囤积仓库，仓库的顶上开了一排老虎窗，那里头就是我的家。

我现在住大杨浦，但还常回家，回去那个瓷器仓库的顶上，特别是夏天，我会在傍晚骑车到那里，从塘沽路的弄堂大门进去，七拐八弯，走到弄堂尽头，进入才一人高的小门，幽深的楼道里，灯泡常常是坏的，但我能数16级——那是台阶的数目。到了楼上，往右拐，走过两户人家，就豁然开朗了。右手边是一块天台，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，盛夏的黄昏，衣服都被收完了，只有四根长长的铁杆，从远处更高的屋檐直刺过来，锈迹斑斑，天台的坡度大概有30度，我们曾在天台上搭好的简陋浴棚已成了储物间，大概新租户总没法儿在一块斜坡上洗澡，但在我们，这完全不是问题。虽然这块小天台的可玩度实在不高，但它的功用却不容置疑，除了晒被子，它就是这栋楼6户人家，整个夏天的唯一舞台。二十多年前，天台上的老老小小大概能凑三桌麻将了，才七点不到，能够调节椅背的竹制躺椅就被齐刷刷地排开，打着赤膊的男人们摇起蒲扇，开始讲荤段子，女人们一般都衣着清凉，刨着西瓜，在铁杆里俯身穿行，交接各种避暑用品——毛巾、冰霜、汽水，但她们声音很轻，偶尔有极放肆的笑，像是滚油里突然放进了食物，一下子噼啪作响，倒是吓到了男人和孩子。

我们一个个才十岁出头，这块视觉上油腻腻的斜坡当然不是我们的终点。斜坡的尽头是一堵一人高的墙，我现在仍然记得第一次翻过那堵墙之后的景象——一大片平台——大概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好像悬浮在月光里的一块舢板，远处没有高房子，浦东还是一片漆黑，平台的边缘就是月亮，沉静得过分，好像千百年来，第一次有人见到这景象。平台的中央有一片老虎窗，从地里冒出来，那是瓷器仓库真正的屋顶，而在西面，则是平安里几十户人家的窗户，踩在石头瓦片上，走过去，坐在平台边缘，就能看小河浜流进黄浦江，进江的地方有一片闸，亮着红色的灯，把水也染成红色，里头泡着一个黄月亮。

在这平台上头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跑！从一个边缘起跑，然后径直冲上那块冒出的老虎窗，看看究竟谁能一次冲顶，然后躺在上头玩倒立，趁机观察底下的男人女人，油膩膩的盛宴结束了，他们在竹

初夏，我和爱人来到大洋彼岸洛杉矶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。

那天早晨，与儿子一起步行到南加州大学。校园内正是蓝花楹盛开时节，道路两旁，教学楼前，一棵棵高大的树冠开满一簇簇紫蓝色花朵，清丽脱俗，气质优雅，把校园染紫了，把天空映蓝了。露天毕业典礼的现场安装了大型电子屏幕，草坪上搭起白色帐篷，摆满椅子。学生们身穿各式学位服，犹如披上节日盛装，在父母和亲朋好友陪同下陆续赶来。

学校中心位置的行政大楼，是一栋最具代表性的罗马式建筑。今天的博士毕业典礼在大楼礼堂举行。参加典礼的亲属安排在二楼，学生则在一楼，一律身着红色博士服。随着音乐响起，毕业典礼开始。学院院长富有哲理、幽默的致词，引来阵阵笑声、掌声。当主持人念到我们儿子的名字“QIAN WAN”(万千)，儿子迈向

主席台，分别与导师、院长握手、拥抱，从院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，我的心也随之剧烈跳动。眼前浮现来洛杉矶当晚和儿子在学区街散步的情景——聊起他从硕士到博士这五年间，先后搬了三次家、挪了四次“窝”，他一向我们指看租住过的房子。初来乍到，人地不熟，对一个从小没有远离过父母的孩子来说是次考验。头几个晚上，他发现寝室有老鼠打闹，不得安宁，只能找房东放捕鼠器。第二次搬家，地面铺的是地毯，床垫有跳蚤，身上被叮咬奇痒难忍，无法入睡，还见蟑螂在地上爬，于是，自己动手买杀虫剂灭虫。几年前，就在他住舍附近发生过两起抢劫和枪击案，导致两名中国留学生遇难，其中一人是他国内大学的校友。

典礼上，遇不少从国内来的

学生家长，大家互留微信，互发照片。礼毕，学校安排免费自助餐。值得回味的是在实验室的家庭式小聚。导师维罗妮卡·伊莱亚森，这位年轻教授是毕业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博士，一头金发，一副金边眼镜，脸上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平时，儿子在电话中常提及，每次国际性学术会议，导师总推荐他去参加。无论是中期答辩还是毕业答辩，提交的每一篇论文，都悉心指导。今天见了，果然可亲可敬。她与来自不同国籍的学生及家人合影留念。韩国籍学生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女儿坐在小推车里，老师一个接一个抱起孩子亲吻，不停逗她们乐。我不禁想起一个忧心与欣慰交集的晚上。四月中旬一天深夜，儿子打来电话说出事了。当地时间早晨六点多，他驾车

和三名同学去圣迭亚哥参加学术会议，因前车紧急刹车，致使他的车追尾，车头撞扁。幸好车上人都安然无恙，只是韩国籍学生额头擦破了点皮。他们第一时间报了警，同时报告老师。导师立即让其先生开车，赶到事发地点附近的小镇，待事故妥善处理，把学生接到圣迭亚哥。这时会议已开始，即将轮到儿子发言。老师问：“要不要先到休息室歇一歇？不讲也没关系。”“没事，可以讲。”儿子像往常一样报告了论文，导师频频点头，用微笑给予赞许……因儿子将要回国工作，我们借此机会向导师表达感恩之情，他淡淡一笑说：“没什么，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
亲历毕业典礼，见证儿子在求学磨炼中长大。行走在校园林荫道上，蓝花楹在微风吹拂下，仿佛含笑向我们招手。



郑辛遥
读好书，亦养生。

躺椅上打呼，她们早已消失不见，有畅快的风起来，好像夏天是活的，终于呼出了一口气。

偶尔也有更刺激或者悲伤的事，就像我们第一次通过天台上的窗户，看见两个年轻人相爱——是平安里一个孩子的外地亲戚。午夜时分，估计他们也没料到，窗外的星星月亮无端就被一群孩子的脸替代。这是唯一一次，然后那三层阁不再招待过这样慷慨的客人。

后来终于还是要别离，在天台上荒废的日子看来也到了头，我们并不晓得那是最后一次，也不



这是我两年内第二次到访奉化，上一次是前年秋天。我应奉化三味书店卓经理的邀请，做客他的书店和奉化中学、奉化高级中学。那次我结识了奉化不少乡贤和父母官，其中几位这回又重逢了，包括翌日驱车领我们去桃林看漫山遍野桃花的沈水波，她去英国探访儿子时曾为我带回一本企鹅版的英文《诗选》。

那次讲座之余，卓经理还领我去了奉化城东裘村镇黄贤村，参观了北宋诗人林逋故居。林逋即林和靖，就是那位独居西湖孤山，终生不仕不娶，唯喜种梅养鹤的隐士，自谓“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”，人称“梅妻鹤子”。据明代张岱《西湖寻梦》记载，南宋灭亡后，有盗贼开挖林和靖的坟墓，只找到一个端硯和一支玉簪。虽说这样一位隐士是否有故居尚值得怀疑，不过，我乐意造访他的故乡（一说他是杭州人）。林逋的祖父曾出仕钱缪王，与胡尚书同朝，或许也受到这位故乡前辈的影响。

说到林和靖，不由想起他的名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有一则少为人知的故事，说的是林和靖的诗名害死了一个皇帝。1276年2月，蒙古大军兵临临安，不满五岁、才做了一年多小皇帝的宋恭帝在皇太后谢道清(台州人)的怀抱里投降了。当年宋太祖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政权，最后又失于孤儿寡母之手。宋恭帝被押赴元大都，后又转移至元上都。十九岁那年，他获准到西藏日喀则萨迦寺出家，法号“合尊”。从此潜心学习藏文，成为一名高僧和佛学翻译家，并做了萨迦寺的主持。他在藏区生活了三十五年，直到1323年，被元英宗赐死于河西（今甘肃张掖），只因他写了一首诗：“寄语林和靖，梅开几度花。黄金台上客，无复得还家。”密探认为这是鼓动江南人心，并称其为宋幼主在京师所作。

黄贤村濒临著名的象山港，这是东海的一个海湾，纵深六十多公里，是一个理想的避风港，周边是奉化、宁海、象山三个县市。从裘村镇向东南眺望，对岸正是象山的西周镇，看着那模糊的山景，我心头不由一热。象山南田岛是我母亲出生、长大的地方，我父亲襁褓中也被爷爷奶奶从温岭带到岛上，

故乡远眺

蔡天新



他们在岛上开设商铺或开荒种地，父亲和母亲是在今天称作南五村的村子里成亲的。

虽然我是在台州黄岩出生、长大，但象山和宁波仍是我的故乡，那里有我的许多亲戚，还有外公外婆的墓。我的《小回忆》开头两篇，均是对南田岛的回忆。成年以后，我曾多次携家回象山探亲，或乘车、或坐船，这次隔水远眺却是头一回，有着别样的心情。那水面上的层层迷雾，仿佛萦绕在心头的一个旧梦，那会儿，双亲均已去世多年。

我有个疑似独家的追踪发现——如果是三四岁年龄段的幼儿，他们进入电梯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寻找按钮，抢先按亮。下行时，一般按“1”，假如被人先按了一指，他们绝不甘心，必定要再按一下。有淘气的孩子，则会嚷着要自己重新按亮，才肯罢休。占有欲？成就感？不懂。父母大人有时也只好退出梯厢，等下一班，圆他（她）做“第一按”的梦。

上行时，孩子们的表现更为积极，一定要亲自按亮自家楼层的按钮。一厢之内，要是同时有几个小朋友，那就热闹了，相互攀比，明里较劲，乘个电梯，闹得“摸高比赛”一样，此起彼伏。够不着？跳起来，抱起来也要按。爷爷奶奶如果某天不小心随手摁了，他们在大“厢”广众之下会肆无忌惮地又哭又喊，像是玩具被人突然夺去一般。有的偌孩子，还会不依不饶，拽出大人，退回梯外，而后等待一个“自己的楼层自己按”的机会。

电梯，可能是城里孩子接触最早、最频繁的电器设备，也是一种可以手动控制的、可以兼作识别数字的免费玩具，按钮就是它的操作开关。长大一些之后，新鲜感消失了，有的男孩子就会显示出顽强的性别特征，往往以乱按为乐，恶作剧为趣，你乘的电梯，一定曾经被熊孩子按亮过满屏吧？而他（有时是团伙作案），早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逃之夭夭，躲在某个角落，偷着乐。

孩子到了一定年龄，开始逆反了，走进电梯，不屑按了，懒得按了，常常是用手指的背部或用钥匙轻轻一击，生怕一不小心被染上什么细菌、病毒。

人的长大，也许是从他拒绝电梯按钮的和平相处开始的。可能生活已经一遍一遍提示他，控制一个按钮，乃至遥控玩具、电动扶梯、自动转门，并不能说明问题，并没有任何意义，还不如控制自己的语言、行动、欲望，更符合主流社会的期许。

人上了一定年纪，事多了，心烦了，意乱了，挤进电梯，满按按钮，成为常事。慌乱之中，错按楼层，也是难免。某天，我的同事忙着一档节目，从十楼电梯进去，着急下去，她一边手指紧按着十楼的按钮，一边奇怪电梯怎么没有反应？退出来，再进去，才知道，按错钮！

当人衰老到一定程度，坐在或被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时候，往往要张口请人代按他要去往的楼层了……这时，如果有一个三四岁的毛孩子出现，应该是两全其美的场景：人生的新老交替，在电梯里实现了完美的交接。

假如电梯的按钮是一双眼睛，那么它在人们进的动作之间看到的将是一个有趣的人生排序：抢按一乱按一不按一自按一漏按一错按一请人代按……这个系列动作，假如剪辑在一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衰老的流程。当然，换个角度，也可以视为“一个人的成长”。

七夕会

玩类玉器，更多地是琢成手镯和珠子。清代是碎硯利用的鼎盛期：“六品官碎硯顶”（《清史稿·本记》）；藏传佛珠多碎硯材质，有的还用绿松石、红珊瑚镶嵌出神秘的佛家符号，藏民认为“使用碎硯佛珠念经可得数倍功德”。现存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的清代“麻布贯头贝珠衣”，在其对襟、下摆等处缝满了成串的碎硯小贝珠，计6万余颗，重十来斤。这是台湾高山族最华丽贵重的服饰。当代收藏圈里也涌动着一股追捧碎硯工艺品的暗流，海南潭门是我国碎硯开采、加工和销售的最大集散地。

洁白的碎硯，虽在历史长度与文化内涵上稍逊一筹，但从其材质的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视角分析，窃以为它可忝列于中国玉文化传统玉材的范围。

碎硯是生活在海洋中的最大贝类，大者直径有一米半，重三百多公斤。其厚达七八厘米的外壳表面有沟槽，状如古代车辙。《本草纲目》记：“车渠，海中大贝也。背上莖文如车轮之渠，故名车沟，曰渠。”我国的西沙和南沙是世界著名的碎硯生长栖息地，黄岩岛贝尤为著名。碎硯是海洋中的“长寿星”，生命周期长达数百年，死后贝壳沉积海底，在高压低温和无氧的环境下，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，贝壳中的碳元素被二氧化硅所替代，成了碎硯化石，而后再继续变质、重新结晶为“蛋白玉石髓”，即“玉化碎硯”。三国魏文曹丕不在《车渠碗赋》中写道：“车渠，玉属也。多纤维缊文，生于西国，其俗宝之。”有专家考证：从明代开始，在车渠两字各加了石字旁，称作碎硯，以示为宝石。

雅玩

“玉化碎硯”是地球上最洁白无瑕的物质，其白度为10。

碎硯被开发利用的史料寥若晨星。现在引用最多的是汉代《尚书大传》中讲的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，散宜生用包括车渠大贝在内的一批奇珍异宝敬献纣王，以赎回周文王的典故：“之江淮之浦，取大贝如车渠，陈于纣之庭。”碎硯生于我国的南部海洋中，当时的捕捞手段极为落后，能在大洋深处捕捞到碎硯，千里迢迢运到中原，当属珍稀之物。此事只能说明当时商人已经认识了碎硯，但还没有开发利用为玉雕材料。明代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的“海物有车渠，蛤属也，大者如长簪，背有渠垄，有蚌壳，故以为器，至如白玉，生南海”，可能是最早的用碎硯壳加工成玉器的文字资料了。

碎硯洁白

徐梦梅

有考古记录出土的、汉代以前的碎硯玉器的实物也是少之又少。坊间古玉器藏品中偶见一些类似古代工艺的碎硯制品，但大多数人以为为天然。现存广州博物馆的西周碎硯管可能是学界认定的最早的碎硯制品。汶川羌民族生活区出土的战国碎硯古珠，是目前数量最大、且有考古记录的碎硯制品。史学家认为：以白色为表征的多神崇拜是羌族原始宗教的显著特点，并沿袭传承至今。古羌人对当地所产的“龙溪玉”视而不顾，却对来自几千公里外的碎硯情有独钟，将其琢磨成珠，用以佩挂或装饰，成为中国古珠史上的一个特例，值得探究。

“玉化碎硯”有人比作是“海洋里的和田玉”。材质虽佳，但取不出大料，只能雕些小摆件和文



边看边聊